

回歸前香港社會本土意識的形成及香港認同建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四五十年代全球性非殖民地化進程，英國迫於時代性與地區性政治運動影響，已經準備在香港逐步調整管治模式，實行「非殖民化」策略。^[1]此後，香港社會結構與（冷戰背景下）經濟模式的轉型，中國內地及世界局勢的變化，真實或想像的內部和外部威脅，以及有關歸屬感的文化印記的變遷等，均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這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總體來說香港人身份認同是建立在與中國內地關係之上的。^[2]1950年代以後，香港社會本土意識在不同文化範疇上獲得成長與蛻變，但這並非由香港社會文化自然發生出來的歷史結果，而是人為推動，並受各種力量牽制而變化。港英政府在漸進撤退的「非殖民化」過程中，刻意發展以經濟為重的商業社會，推行非政治化政策，在去民族主義措施下，有方向、有目的地實施「再殖民化」步驟。^[3]香港回歸後，體制及意識形態領域遺留的殖民性因素制約著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重構。我們需要將身份認同問題放到具體的歷史階段中去分析和反思。

一、空間維度上的區隔是香港社會本土意識產生的最直接原因

從開埠到新中國成立前，香港都是一個開放的移民社會。粵港兩地人民進出往來，基本上不受限制，邊境界綫十分模糊。平常每天有4班火車，還有汽車和輪船來往深圳和香港兩地。^[4]當時對於大部分香港移民來說，香港是謀生地、臨時寄居地，最後還是會選擇落葉歸根，故對港英政府統治的香港沒有歸屬感。粵港兩地間人口自由流動真正開始受到限制，是1949年港英政府對香港居民進行首次登記；並在1950年公佈《人民入境統制（補充條例）》，同年5月封鎖深港邊界，這一行政手段和邊境政策標誌著「香港人」身份的出現。同年7月深圳羅湖公安檢查站設立。此後，1951年9月1日中國政府實施《關於往來香港、澳門旅客的管理規定》，中國公民往來港澳地區時須接受出入境管制，結束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三地自由出入境的情況。^[5]中英雙方先後施行控制出入境的政策，使兩地往來人流

1 限於當時社會全力以赴進行戰後重建，逐步的工作也在進行，如「楊計劃」（The Young Plan）。該計劃是指1946年由當時香港總督楊慕琦提出的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方案。1952年10月，港督葛量洪正式宣佈放棄計劃，該計劃最終並沒有實現。

2 Wang Jialin, *Discursive Strategie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 Study Based on the PAs of the HK Governments Pre- and Post- Transition*, Jina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58.

3 強世功：〈帝國的技藝——香江邊的思考之三〉，《讀書》2007年第11期；鄭宏泰、黃紹倫：《香港身份證透視（第二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201頁。

4 于環：《深港邊界今昔》，載深圳市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深圳博物館編：《深圳文史第14輯·百年滄桑 深港軼事》，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頁。

5 香港地方志中心編纂：《香港志：總述·大事記》，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第254頁。

大為減少。^[6]

此舉帶來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其一，封鎖邊境，使得粵港兩地民間自由交往形成的空間即被切割分離，人的流動性狀態被打破了，香港移民社會形態開始有所改變。原本在與內地的緊密聯繫中可以確定香港的文化身份；^[7]切斷聯繫後，兩地文化心理上逐步產生隔閡，香港華人社會對內地同胞的「他者」想像開始萌芽。此外，人口遷移性減少，客觀上也增強了傳統形式的地方文化認同。

其二，教育相關性被掐斷，此後在香港出生的、受教育的人遠比以前多，香港華人很難再返回內地接受教育。港英政府利用這一時機，改變戰前一直執行的不干預政策，很快決意通過教育的控制和管理來加強英國的影響。支配性的制度和意識形態開始發揮重要影響。殖民教育體系一方面大力推行英文教學，培養對宗主國的文化臣服；另一方面強化「香港人」身份意識，讓本土意識與對中國的認同區隔。

其三，本地出生人口逐漸成為人口構成的主體。1971 年在香港 400 萬人口中，只有 185699 人填寫家庭籍貫是香港，不到總人口的 5%。^[8]連結第一代移民的祖籍地緣關係慢慢被淡化。香港社會出現了一批「生長於斯、受教育於斯」的，沒有濃厚「故鄉」觀念的一代。和以前大部分居民都懷著過客心態相比，視香港為家的「香港人」日益增多。^[9]香港本地出生人口的變化是反映人口當地語系化趨勢的一個重要指標。《香港人口普查報告書》顯示，1931 年香港出生人口僅佔總人口的 32.9%，1961 年該比例上升到 47.7%，1971 年香港本地出

生人口已經達到總人口的 56.4%。^[10]戰後「嬰兒潮」一代的出生和成長，使得香港的屬地認同得以加強。這為隨之而來的香港社會本土意識的萌生及滋長提供了客觀條件。因此，王家英認為後來所謂的「香港意識」或香港「文化特質」（ethos），很大程度便是在 1950 年代以後慢慢形成的。^[11]

二、港英殖民政府逐步加強香港本位的意識形態塑造

1949 年港英政府為了防備中國的反帝反殖鬥爭延伸至香港，制定了系列影響香港居民人身自由和社會治安的政策。如首次施行人口登記制度以控制人口；通過修訂《1949 年社團條例》規定一切在香港活動的社團必須登記，用以收緊一些政治團體在香港的活動空間。^[12]尤其是一些涉及敏感政治議題的，都可隨時取締。當時一些左派色彩濃厚的組織和人物，便逃不過政府的監控和打壓，文化藝術界中也有人因此被驅逐出境。例如，1952 年初港英政府將左翼電影人士馬國亮、齊文韶、劉瓊、司馬文森等十人強押出境。^[13]紅黃藍美術研究社合法登記，成立一年多就被指控觸犯法例第 5 條，勒令停止活動。^[14]長期以來，香港社會運動基本上都屬中國政治的延伸，港英政府對此十分警惕，嚴密監控工會和壓力團體。

為了避開政治性影響，港英政府一方面表面上順應非殖民化政策，推動公務員本地化，讓本地華人參與市政局與公共服務機構事務

6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身份證透視（第二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8 年版，第 11、170 頁；劉蜀永：《簡明香港史》（新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9 年版，第 363、365 頁。

7 楊匡漢：〈文化的驛站——香港與內地藝文關聯的一個側面〉，《文藝研究》1999 年第 2 期。

8 陳麗君等：《香港人價值觀念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28 頁。

9 冼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載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7 年版，第 202 頁。

10 劉蜀永：《簡明香港史》（新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9 年版，第 365 頁。

11 王家英：《香港人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一個自由主義的解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1996 年版，第 5 頁。

12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身份證透視（第二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8 年版，第 71 頁。

13 黃愛玲：《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 2），香港電影資料館 2001 年版，第 40-41 頁。

14 梁秉鈞等著：《痛苦中有歡樂的時代：五〇年代香港文化》，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3 年版，第 151、173 頁。

管理。^[15] 另一方面極力推崇和協助建立以香港為本位的街坊福利會，迴避與中國有政治聯繫的同鄉會、商會等社團。在港英政府的積極介入下，各種宗親、街坊福利會的活動蓬勃發展。有資料顯示，到了1960年，香港已有60個街坊福利會；這些街坊福利會不僅辦理義學、診療所等，還為政府宣傳各種政策，成為殖民政府維持社會安定的重要手段。1960年代後期，港英政府進一步在10個地區民政署（及新界民政署）、社區中心、服務處執行新的社區政策。一是為了收集市民意見，處理政策和民情的上傳下達；二是為了加強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贏取香港市民的支持。^[16]

20世紀50至70年代處於冷戰方酣之中，是香港意識形態鬥爭很激烈的時期。^[17] 文化教育事關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爭奪。港英政府加速推動「去中國化」的文化和教育政策，削弱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一方面從語言著手，強化英語課程教學，^[18] 禁止中小學教授國語（普通話），嚴禁學生使用簡體字。輕則斥責、扣分，重則罰站、尺刑、記過，寫簡體字似乎不是語文問題，而是品德問題。甚至公共圖書館裏的兒童中文圖書，也大部分台灣出版，絕少內地出版的簡體字書籍。^[19] 有研究指出1953年香港英文中學的數目首次超越中

文中學，並迅速成為社會主流。^[20] 另一方面執行「非政治化」的教育體系。一是1952年香港教育署修訂教育法例，對學校進行「政治宣傳」加以限制；^[21] 二是加強對學校課程內中國歷史、語文和文學的審查。採取實用主義教育策略，強調以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知識、道德觀念抵消中國內地和台灣地區所強調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切割了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當時老師不可隨意在課堂上談論政治。^[22] 通過中國文化科目，一代代香港華人認識到自己中國人的身份，然而這種身份卻與當代中國無關，是一種與經驗相隔離的較為抽象的中國人身份。^[23] 這對香港華人的行為認知影響深遠。有研究顯示香港華人的中華民族認同偏重於對民族性格（勤奮上進）及民族歷史文化的肯定。^[24]

1967年反殖抗暴事件^[25]發生後，為了壓制香港華人社會的民族主義和反殖情緒對殖民統治秩序的破壞，港英政府進行了系列政策調整。一方面修訂《公安條例》，嚴格限制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將處理公安事宜的各項條文（如《公安條例》《保安條例》及《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綜合為一條法例，其中對集會、遊行、示威及聚集作出

15 實際上，整個港英政府架構中的決策層（行政與立法兩局）並未做重大政改，只是行政層實行「本地化」發展，這一現象後來金耀基總結為「行政吸納政治」。鄭赤琰：〈戰後香港政制發展〉，載王廣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48頁。

16 冼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載王廣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9、200、206頁。

17 有學者認為冷戰就是心理戰，就是用「和平方式」屈敵，即用宣傳的武器來瓦解敵方的立場，爭取人的思想和意志。行動的武器存在於思想文化領域。參見〔英〕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曹大鵬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3、165頁。

18 游靜回憶她成長的七八十年代，英文好等於步步高升出人頭地，中小學十多科裏，什麼科都不敵英文。游靜：《我從未應許你一個玫瑰園：香港文化政治生態》，香港：文化工房出版2014年版，第133頁。

19 陳智德回憶20世紀80年代香港中學會考，仍有不成文規定考生不得寫簡體字，否則逐字扣分。陳智德：《地文志：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年版，第188頁。

20 馬傑偉：〈電視文化的歷史分析〉，載吳俊雄、張志偉編：《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修訂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81頁。

21 陳麗君等：《香港人價值觀念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2頁。《1952年教育條例》設立諮詢機構教育委員會，並嚴格規管學校、校監、校董、校長、教師、校舍設備與教育課程，避免學校成為政治宣傳工具。同年，成立課程與教科書委員會，統籌課程與教科書的規劃與審核工作。香港地方志中心編纂：《香港志：總述·大事記》，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259頁。

22 周永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增訂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122頁。

23 1952年，香港教育署任命一個委員會檢討香港學校課程內中國歷史、語文和文學的問題。1953年11月，該委員會建議著重中國文化，以抵消內地和台灣強調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參見高馬可（John M. Carroll）著：《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林立偉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84頁。

24 相對其民族認同中的政治建構則存在一定的疏離甚至抗拒。王家英：《香港人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一個自由主義的解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1996年版，第9、14頁。

25 受內地文革影響，1967年由勞資糾紛引起，最初罷工、示威，發展至後來成為反英殖民抗爭運動。該事件間接促使當時的港英政府改善施政。

管制。^[26] 另一方面在學校教育中調整了語文教育政策，規定所有中文小學都以粵語（廣州話）授課。1970 年取消中學會考國語科，並於 1973 年出版的綠皮書上建議初中應該採用母語（廣州話）教學。許寶強認為這些措施或可理解為舒緩學生壓力，同時希望能有效推行灌輸式教育；這也是為了抗衡中國革命思潮，推行「去國族化」教育的體現。^[27] 劉鎮發分析這一舉措是讓非粵語方言的華人下一代融合成一個語言團體，便於推動以粵語為中心的香港認同。^[28] 1970 年代中期粵語流行文化的興起看起來是自然而然的市場行為，但其語言基礎與殖民政府有意識的引導不無關係。

1972 年 4 月，港英政府改變了百年來的移民及人口政策，給予連續居港滿 7 年或以上移民以永久居民身份（證）。永久居民身份政策與社會福利、房屋、教育等待遇直接掛鉤，由此以立法形式確立香港居民「利益共同體」意識，喚起了居民的身份認同議題。^[29] 1980 年 10 月 23 日，香港人口政策出現重大轉變，「抵壘（touch base）政策」^[30] 的結束和硬性規定攜帶身份證政策的實施，不僅使香港的人口結構漸趨穩定——香港社會有了固定人口，而且使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進一步強化。1970 年代英國經濟不振，國內種族主義與反移民情緒高漲，英國政府在 1982 年啟動香港問題談判前，為防止談判失敗英國撤出香港時大量香港人湧入英國，修改國籍法。^[31] 1986 年，英

國政府按國籍法提出《香港（英國國籍）令草案白皮書》，規定：香港原居民及在香港出生的人士被稱為「英國屬土公民」，持有者沒有在英國本土上的居留權。香港社會反應強烈，許多香港人認為，這實際是「二等公民」。^[32] 這徹底打破了香港華人對英國的幻想，促進本土意識迅速崛起。

三、經濟結構演變及全球化發展對香港人身份建構的影響

英國殖民統治已實施一百多年後的 1950 年，香港產業結構單一，只依賴少量轉口貿易生存，香港的總出口中約八成屬轉口，且絕大部分和中國內地有關；當時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只有 31.5 億港元，人均收入 1400 港元，按當時的匯率折算不到 250 美元。^[33] 1950 年代初美國宣佈對中國實施全面禁運，並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對華貿易禁運的提案。在 1951-1957 年這段時期，內地和香港的交流互通幾乎斷絕，一直到禁運終止，兩地才漸次恢復交往。^[34] 受之影響，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香港對內地的出口（包括本地產品出口和轉口）一直處於較低水平（見表 2-1），但同期內地對香港的出口還持續增長（見表 2-2），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內地一直都是香港的糧食和一般民生基本所需物品的最主要來源。

冷戰時期，香港原本賴以生存的轉口貿易急速萎縮，尤其是與中國內地及美國的貿易，經濟出現危機。20 世紀 60 至 70 年代，當

26 李曉惠主編：《香港社團理論與實務》，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2019 年版，第 49 頁。

27 許寶強：《缺學無思：香港教育的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4 頁。

28 劉鎮發：《香港兩百年來語言生活的演變》，華人地區語文生活與語文計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福建武夷山 2002 年 1 月。

29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身份證透視（第二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8 年版，第 3、12 頁。

30 1974 年 11 月至 1980 年 10 月港英政府針對中國內地非法入境者實施的難民政策，即非法入境者若成功抵達香港市區，便可成為香港合法居民居留香港；若在邊境禁區被執法人員截獲，則被遣返。

31 1981 年 10 月 30 日，英國國會通過《1981 年英國國籍法令》，並授權英國政府根據國籍法頒佈國籍令。規定自 1983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憑香港關係取得的聯合王國及殖民地公民身份，或生效日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人士將被劃為英國屬土公民，不再享有定居英國的權利。

32 梁振英：〈修改英國國籍法的深刻教訓〉，《明報》2007 年 3 月 16 日，載梁振英：《家是香港》，香港：明報出版社 2007 年第 2 版，第 9 頁。

33 Catherine R.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1945-1965* (London: Routledge, 2001), p.4. 轉引自嚴飛：〈殖民管治香港的要義——評《管治香港》〉，《二十一世紀》2013 年 6 月號總第 137 期；莫凱：《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載王廣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7 年版，第 298 頁。

34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身份證透視（第二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8 年版，第 170 頁。

時工業國家特別是美國和日本開始向外轉移製造業。香港抓住這一時機，利用低廉的勞動力^[35]和生產要素成本、轉口貿易時代留下的各種設施和商業關係，以出口為主導，全力發展製衣、玩具、塑膠、電子工業等勞動密集型生產。^[36]源源不斷的資金湧入香港，不但高漲了本地商人們的投資熱情，也為香港民生工程項目提供了充足的資金。從1970年代開始，香港從內地進口的食品價格平均較國際市場低50%以上，原料約低30%，衣服等消費便宜25%。^[37]這對促進香港經濟崛起顯然是一種助力。1960年代的香港，人均GDP仍然相對較低，而此後香港經濟的崛起，外加民生的改善，人們願意拚命工作，作出犧牲，甘心接受港英政府權威領導，從而提高了殖民統治的認受性。

中國內地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後，香港愈來愈密切地與廣東省重新結合，並構成共生關係。^[38]20世紀70年代末香港製造業開始北移到珠三角地區，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商務、貿易及旅遊等服務性行業在香港的增長。1980年代中期，當新加坡經濟嚴重衰退時，香港因與廣東的特殊關係而繁榮興旺，縱然當時遷離香港的人數每年超過5萬，香港的地產和股票市場仍舊興旺不衰。^[39]此後，香港逐漸轉型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服務性行業的蓬勃發展，成功吸納了被辭退的大

部分原製造業工人，當時香港失業率維持在約2%的低水平。^[40]

同期，經濟結構轉型也創造出許多新的、需要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就業職位讓年輕人去從事，保證了大多數低下階層及普通中產「向上流動」的空間。香港經濟多元化帶來社會結構的多元化，促使中產階層及專業階層開始冒起，出現社會利益訴求的多元，也出現了一些以職業或行業會聚而成的新的社會團體。社會團體關注的議題，也逐漸從早期關注的福利等民生議題，轉向政治議題。這一政治經濟格局和生態變化促使港英政府改變對社會團體的管理方式——放鬆管控；推動「代議政制」改革，擴增了立法局席位以安排不同功能界別、產業或專業代表。1980年代後香港論政團體和參政團體逐步興起，社會團體的倡議政策議題得到擴展，參與行動也有所增加。^[41]

1965至1990年間，香港的經濟發展被世界銀行譽為「東亞奇蹟」，既取得驕人的增長，民眾亦能共享發展成果（World Bank，1993）。因經濟成就而生的自信心和優越感，成為香港認同的重要因素。象徵香港「本土性」的獅子山精神^[42]即是在那個年代政治經濟環境中被生產並引發共鳴的。獅子山精神肯定了香港華人只要肯幹，就會出人頭地。而且不僅草根階層如此，當時也見諸於各行業。^[43]獅子山精神作為香港精神的化身，亦成為本土意識的重要載體。但凡香港發生社會危機時，獅子山精神即承擔喚起社會凝聚力、號召共渡時艱的重任。

35 1960-1973年13年內，有大量非法移民涌入香港，大部分是青壯人口。

36 莫凱：〈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載王廣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99、301頁；王鳳超：《香港政制發展歷程（1843-2015）》，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版，第18頁。

37 徐日彪：〈為順利解決香港問題奠定扎實基礎——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與香港回歸〉，1997年6月24日《人民日報》第9版。

38 1978年至1987年間，到訪廣東省的香港居民超過3,000萬人次，同期逾17萬名內地居民探親到訪過香港。高馬可（John M.Carroll）：《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林立偉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第216頁。

39 〔美〕傅高義：《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凌可豐、丁安華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370頁。

40 經濟學家認為低於4%的失業率可稱為充分就業。饒美蛟：〈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載王廣武主編：《香港史新編（增訂版）》（上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440頁。

41 李曉惠主編：《香港社團理論與實務》，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44頁；王鳳超：《香港政制發展歷程（1843-2015）》，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版，第65頁。

42 《獅子山下》是香港電台電視部於1974至1979年、1984至1988年、1990年、1992至1995年以及2006年間所製作的實況電視劇系列，以處境故事述說草根階層的掙扎歷程，刻畫了逆境自強的時代集體風貌。

43 許煜：〈獅子山精神的批判〉，載王慧麟等編著：《本土論述年刊2009》，台北：漫遊者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頁。

表 2-1 香港本地產品出口美國、英國、中國內地市場份額（1961-1991）

1961 年		1971 年		1981 年		1991 年	
市場	份額 (%)	市場	份額 (%)	市場	份額 (%)	市場	份額 (%)
美國	23.1	美國	41.5	美國	36.3	美國	27.2
英國	20.1	英國	14.2	英國	9.6	中國內地	23.5
				中國內地	3.6	英國	5.9

資料來源：Hong Kong Review of Overseas Trade,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轉引自莫凱：《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載王廣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7 年版，第 333 頁。

表 2-2 商品進口中國內地、日本、英國、美國來源份額（1951-1991）

1951 年		1961 年		1971 年		1981 年		1991 年	
市場	份額 (%)	市場	份額 (%)	市場	份額 (%)	市場	份額 (%)	來源	份額 (%)
中國內地	17.7	中國內地	17.2	日本	24.3	日本	23.2	中國內地	37.7
英國	12.7	日本	14.5	中國內地	16.4	中國內地	21.3	日本	16.4
日本	8.1	英國	12.7	美國	12.5	美國	10.4	美國	7.6
美國	7.7	美國	12.2	英國	7.9	英國	4.5	英國	2.1

注：香港的商品進口一部分供民生日用所需，稱為留用進口；另一部分為工商各業作為投入用於轉口。

資料來源：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Hong Kong Review of Overseas Trade,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轉引自莫凱：《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載王廣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7 年版，第 331 頁。

四、報章雜誌及副刊專欄的文藝生產與本土意識有著明顯的互動關係

有研究顯示 20 世紀 50 至 60 年代中期，香港中文報章所關注的新聞內容明顯出現了本地化趨勢，逐年增加與本地事務有關的社論。強調社會民生及經濟發展的「社經報業」以市場為依歸，強調本地意識、淡化政治及黨派主張，日益成為報界主流。「社經報業」的本地性一直延續至今。^[44] 劉蜀永認為這是讀者需求和報業人員構成共同變化的結果。^[45] 新一代成長起來的香港人比他們上一輩更加關注本地的現狀與未來。但英國殖民政府的新聞管制在此也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46] 從二戰後到 1980 年代，香港人習慣在言論上有所避忌。^[47] 與英國殖民政府意識形態導向相一致，大部分的香港報章缺乏輿論監督本地政府的功能，具有「非政治化」的傾向和特色。因此，資訊提供與娛樂功能成為報章十分強調的元素。^[48] 儘管香港報章對內地的關注從未間斷過，但在殖民統治下國家和民族意識被壓制了，允許表徵的仍是繼承中國文化的、剔除政治立場的抽象身份概念。

香港文藝刊物、報紙的副刊專欄既是批評時政與社會民生的文

44 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王廣武主編：《香港史新編（增訂版）》（下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 600 頁。

45 劉蜀永：《簡明香港史》（新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9 年版，第 408 頁。

46 港英政府制定了系列限制新聞自由的條例，以 1951 年 5 月制定的《刊物管制綜合條例》最為全面及苛刻，總計 84 條。此例授權港督會同行政局，禁止任何可能損害香港安全、導致罪案發生、影響公眾秩序、健康或道德的刊物進口。任何報刊會導致他人犯罪、支持非法的政治團體、影響公共秩序、健康或道德者，法庭可根據律政司申請查禁或暫停違例報刊出版 6 個月。此外，任何報刊惡意散發可能導致公眾不安的虛假消息，即屬違法。此例還規定不得發表任何煽動正常社會秩序的言論。港英政府在維護本身的統治權威上，十分強硬。香港報章對殖民統治不滿或造成威脅，它隨時按例對付，對報紙言論起到「冷卻」效果。報章通常會自我審查，也免不了時時開天窗。參見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載王廣武主編：《香港史新編（增訂版）》（下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 598、599 頁。

47 政治話題最好不在公開場合討論，批評政府不能太過分。周永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2019 增訂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9 年版，第 92 頁。

48 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載王廣武主編：《香港史新編（增訂版）》（下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 601 頁。

化空間，也是孕育香港文學及培養香港優秀作家的重要園地。因此，香港的文化通常被視為雜誌的文化而不是社團的文化。^[49]作為商業性媒體，如果想受人歡迎並有利可圖，就必須刊登與時代風氣、市民所思所想相共鳴的內容。這些大眾傳媒上的文藝作品是當時社會背景的表達手段。香港的本土意識在 1970 年代以來城市敘事創作中的映現即是社會普遍心理的體現。當時不僅許多青年作者土生土長，在本地接受教育，而且讀者層面也歡迎「香港化」的內容。不少以香港為寫作對象和題材的作品，大量湧現於不同的報章及文藝刊物上，如《四季》《大拇指》《羅盤》《素葉文學》等；^[50]1979 年《香港文學》雜誌創刊，也培育了一批本土意識頗濃的作家，如何紫、阿濃、西西、陸離、小思、亦舒、古蒼梧、黃國彬、何福仁、也斯、淮遠、鍾玲玲等。^[51]

伴隨香港發展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作家形成了一種新的寫作風格，他們也逐漸成為香港文壇的中堅力量。他們在創作內容上帶有鮮明的本土意識，將香港故事與個人日常生活經驗中細微事物的書寫相聯繫，這種文學感受力的轉變反映出時代的特徵。趙稀方指出，「敘事者在城市中看到了什麼，忽略了什麼，呈現出了什麼，這些缺席與在場都是一種意義的表達，它們構成了敘事者與城市的不同關係」；^[52]從不同層面自覺生產對香港本土的認同感與歸屬感。新一代作家從情感上敏銳地察覺到市民身份歸屬上發生的變化。儘管小說內容避免宏大敘事，看上去和當時重大政治社會問題無關，但在最深刻的層面上仍感性地表現出香港華人所經歷的變化和衝擊。情緒成為小

說創作中的核心主題。西西的小說《我城》（1975 年在香港《快報》上連載近半年）開啟了城市敘事的篇章，1979 年成為「素葉文學叢書」首部刊行文學書，被視為香港本土文學中最具代表性作品。趙稀方認為，《我城》標誌著新一代本土香港人對於香港的認同。^[53]「我城」是一個只有「城籍」而無「國籍」的地方，「國家」的存在無法在地方上得到體現。在小說童話般語言敘事裏，「國家」是以父親缺失的隱喻形式無時不在，召喚但卻面臨著難於言說的窘境。對身份認同的焦慮思索在行文中隱形並存。後來西西在其小說《浮城志異》中，又將香港稱為「浮城」，形象地描繪了整個社會情緒——對過去沒有根底，對未來沒有展望，對現狀未能安定——的狀況。「我城」「浮城」所隱喻的本土意識及焦慮情緒，在香港社會中產生了極大的共鳴。

本土意識不是一代人生成的，它有著逐步發展的過程。身份認同也是基於集體記憶與文化結構形塑起來的幾代人的印記。只不過隨著時代發展，印記的形式以及不同代際對此的理解未必一致。1938 年出生於香港的張浚華，以友聯社《兒童樂園》編輯、文化機構負責人身份活躍文化界。她在訪談中回憶年輕時和當時大部分香港人一樣對政治冷感，但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不會強調自己是香港人。^[54]1952 年出生於香港的葉輝，1970 年代即投身香港新聞出版事業，也參與文學實踐及詩刊編輯出版工作。他在訪談中亦提及他那代人在剛進行創作時並沒有想到自己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大概在 1970 年到 1982 年這一階段才慢慢開始認識到本土意味著什麼。在他看來本土即童年記憶及生活的根，是創作和精神家園。就像南下作家大都懷念過去，寫自己的故鄉一樣。^[55]陳國球在一次訪談中也提到 20 世紀 70 年代

49 洛楓：《流動風景：香港文化的時代記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 頁；也斯：《香港文化十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7 頁。

50 洛楓：《流動風景：香港文化的時代記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 頁；趙稀方：《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9 年版，第 381-410 頁。

51 黃維梁：〈香港文學的發展〉，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增訂版）》（下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 619 頁。

52 趙稀方：《小說香港》，第 47 頁。

53 趙稀方：《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9 年版，第 407 頁。

54 盧瑋鑾、熊志琴編：《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二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7 年版，第 189 頁。

55 莊向陽等：〈葉輝：香港文學正處在重要的轉折期〉，2011 年 2 月 20 日《晶報》B04-05 版。

《中國學生週報》上關於什麼是「香港人」的討論對其有很大影響。^[56]可見，議題經過不斷重新闡釋、爭論獲得某種特定含義，成為普遍社會心理的生發器，這也預示著社會心理的產生及變化。陳智德指出香港文學的「根著」意識源自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化人對失根、無根的體認，後來逐漸轉化成「根著」的本土意識。同時「流動」的力量衝擊了好幾代香港作家，迫使他們徘徊在去與留、認同與否定，在無根與歸屬間掙扎，催生新的創造。^[57]故而形成香港文學的獨特風格，即強調香港的歷史經驗、集體記憶、主體意識，身份困惑、身份焦慮則是不變的母題。

五、流行文化的發展對本地認同感和歸屬感培育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流行文化^[58]在生成、擴散和強化身份認同過程中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二戰後香港約有 60 多萬居民，1949 年前猛增到 200 多萬人，當時講「國語」（普通話）的人口佔據總人口的大多數，形成了「南北和」的局面。^[59]很多導演、製片人、劇作家和名演員從上海來香港，掀起國語電影的熱潮。^[60]由於日常語言方面的變化，香港的流行音樂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逐漸以國語時代曲或西方流行曲取代俚

俗的粵曲。^[61]呂大樂回憶，在粵語流行曲大行其道之前，「戰後嬰兒」差不多完全放棄了廣東歌。^[62]既然這樣，粵語（廣州話）是如何開始主導市民日常生活語言的呢？

事實上，被稱為「本地人」的香港人，所使用的方言雖然也屬粵語系統，但是一種與廣州話有相當差別的「圍頭話」；據 1898 年統計，這些新界本地人的人口有 64,140 人。^[63]香港語言學家劉鎮發研究發現：廣州話在香港的歷史其實只有一百多年，對粵語（廣州話）的重視與運用是當年港英政府語言政策的重心。前文已提及過港英政府強力推行中文學校粵語（廣州話）教學。1967 年反殖抗暴事件之後，港英政府進一步取消非粵方言廣播，廣播管理法也限制中文電視台只能使用粵語（廣州話），目的是製造以粵語為中心的香港認同以抵抗中國認同。在 1961-1971 年之間，接近四成的非粵語人口改以粵語為日常語言。^[64]文化人類學觀點認為語言是辨識「自己群體」裏他人的文化標記；同一語言可以從情感上促使我們將自己社會裏的其他人視為「名譽親屬」；而差異語言則會傳播偏見性敵意。^[65]殖民政府推動廣州話發展成為港式粵語，以日常語言的高度一致來建立本地身份認同。

這一有意干預過程消融於日常生活中，不為人所知。而大家所熟知的則是 1970 年代中期許冠傑、葉紹德等重新以粵語入曲帶動起新的文化潮流。新的粵語流行音樂綜合了海派時代曲、台灣國語時代

56 李浴洋：〈重探「香港文學」——陳國球教授訪談錄〉，《文藝研究》2018 年第 8 期。

57 陳智德：《根著我城：戰後至 2000 年代的香港文學》，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版，第 69-96 頁。

58 發端於 1970 年代的香港流行文化與香港人的生活關係密切，表現出一個社群於不同時代的特色，主要包括電影、電視、戲劇、流行音樂、漫畫、報業及時裝等商業化的娛樂。參見陳清僑等：〈近二十年香港普及文化書目概覽（1974-1994）〉，《香港文化研究》1995 年第 1 期。

59 1937-1939 年為躲避日軍點燃的戰火，有 60 萬人移居香港；新中國成立前夕，為躲避新政權，又有 130 萬人移居香港。參見深圳市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深圳博物館編：《深圳文史第 14 輯·百年滄桑 深港軼事》，深圳：海天出版社 2014 年第 222 頁。

60 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文化藝術政策回顧（1950-1997）》，2000 年 7 月 15 日，第 10 段。

61 1963 年開播的香港商業電台第二台以播放流行音樂為主，選歌緊跟外國唱片市場。年輕一代熱衷於追隨世界潮流，樂於接受西方輸入的新奇事物。參見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67 頁。

62 呂大樂：《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增訂本），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8 頁。

63 香港地方志中心編撰：《香港志：總述，大事記》，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20 年版，第 19 頁。

64 劉鎮發：〈香港兩百年來語言生活的演變〉，華人地區語文生活與語文計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福建武夷山 2002 年 1 月。

65 〔澳〕約翰·哈特利、賈森·波茨：《文化科學：故事、亞部落、知識與革新的自然歷史》，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7 年版，第 183-184 頁。

曲和歐美流行曲的影響，形成具有香港獨特時代內容和風格的音樂品種，被視為老少咸宜的香港市民歌。^[66] 這也如同期其他流行文化，新浪潮電影、文學上的同人雜誌與創作、劇場電影和電視上的轉變，都是一個本土化的轉折點。^[67] 當粵語歌曲成為創作主流時，進一步加速了港式粵語文化的普及，^[68] 國語（普通話）開始遠離市民日常生活。

1967 年之後商業廣播電視開始為香港市民提供免費電視服務，香港即進入電視文化的全盛時期。在當時，電視作為新的通信手段，對廣大民眾的思考方式有極大影響。伴隨著電視走進千家萬戶，^[69] 本地製作的電視劇集和綜合性娛樂節目成為一般中下階層市民最大的日常娛樂。1973-1978 年間，外國電視節目從黃金檔位悉數退出，代之而起的是完全本地製作的節目。^[70] 有關本地流行文化的各種獎項陸續成立，頒獎禮成為廣受民眾關注的電視現場直播節目，這可見本地流行文化產業化的快速發展。^[71] 這不但標誌著香港意識本土化的過程，同時電視劇集的故事、形式及意識形態，更成為當時社會大眾的道德

標準及價值取向。

電視連續劇反映出一套世俗化的價值觀，與中國傳統價值存在很大差異，比如個人利益比集體利益重要，個人對物質享受的追求被視為合乎情理的要求，等等。這些世俗化的價值觀念在當年社會早已存在，並產生了許多具體的社會後果。電視劇往往不自覺地採用了當時流行的意識及論述，對社會心理起到一種強化的作用。^[72] 與此同時，以「北望神州」為中心內容的電影創作則逐漸淡出影壇，取而代之的是與市民相貼近的本地現代都市生活。^[73] 其他港式流行文化的商業生產，也均採用本地化的表現形式。內容往往能呼應社會現實的變化，講述香港本土故事，因而能引起受眾廣泛共鳴，對本地文化及身份認同產生重要影響。^[74]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港式流行文化形成，對中國內地、東南亞各國及海外華人社區的輻射，為香港華人帶來不少文化上的自豪感。

大眾文化場域中另一股外部力量也在影響著市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及文化認同。香港 1950 年代引進本地的美國流行文化，到了 1960 和 1970 年代影響力更大。呂大樂認為認識香港社會及文化，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冷戰政治不可忽視，它們參與塑造香港獨有的社會、文化面貌。^[75] 當時香港各種文化載體被美國用作意識形態塑造的首要工具。1957 年 7 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批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 5717 號《美國對香港政策》，建議利用香港作文化宣傳活動和搜集中國情

66 劉靖之：《香港音樂史論：粵語流行曲、嚴肅音樂、粵劇》，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2013 年版，第 19、473 頁。

67 也斯：《香港文化十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4 頁。

68 有學者指出 1970 年代中期許冠傑的粵語流行曲，是討論香港本土文化的重要議題。他的一系列社會諷刺歌曲，如《賣身契》《加價熱潮》《半斤八兩》等，成為市民大眾賴以宣泄對現實不滿的渠道。同時也帶動了本地方言文化的潮流，並影響至海外華人地區。目前相關資料，可參考黃志華：〈許冠傑的神話〉，《粵語流行曲四十年》，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0 年版，第 65-81 頁。黃志華：〈一種文化的偏好？論粵語流行曲中的諷刺寫實作品的社會意義與藝術價值〉，載冼玉儀編：《香港文化與社會》，香港大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2-229 頁。洛楓：《流動風景：香港文化的時代記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 頁。

69 1961 年時電視機還是一種奢侈品，到了 1971 年全香港七成家庭都已經擁有電視機了。電視滲透率在 1967 年時佔人口的 12.3%，1977 年上升至 90%，八十年代達 98%。冼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載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7 年版，第 206 頁；Chan, Joseph M., Eric K.W.Ma and Clement Y.K.So. 1997. "Back to the Future: 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 for the Hong Kong Mass Media." In Joseph Y.S. Cheng(ed.),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7*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465. 轉引自馬傑偉、曾仲堅：《影視香港：身份認同的時代變奏》，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0 年版，第 28 頁。

70 陳啟祥：〈香港本土文化的建立和電視的角色〉，載冼玉儀編：《香港文化與社會》，香港大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4 頁。

71 呂大樂：《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8 頁。

72 有關 1970 年代香港電視文化的討論，可參考龔啟聖、張月愛：《七十年代香港電影、電視與社會關係初探》，載 1984 年第八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回顧與座談會「七十年代香港電影研究」文集，第 10-13 頁；馬傑偉、曾仲堅：《影視香港：身份認同的時代變奏》，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0 年版，第 29、47 頁；洛楓：《流動風景：香港文化的時代記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 頁。

73 劉蜀永：《簡明香港史》（新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9 年版，第 412、418 頁。

74 王國華主編：《香港文化發展史》，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4 年版，第 9 頁。

75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3 年版，第 96 頁。

報的中心。^[76] 美國利用的文化武器是刊物、圖書、會議、研討會、美術展覽、音樂會、授獎等等。^[77] 受美元資助的機構如友聯出版社、亞洲影業公司、《兒童樂園》《中國學生週報》^[78]《大學生活》《人人文學》《今日世界》《亞洲畫報》《祖國週刊》等中文報刊。這些被資助的出版及文化活動大多以商業運營模式作掩護，或明或暗地推銷西方尤其美國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有學者認為它們以不明顯的政治色彩培養潛在的親美思想，以贏得擁護和影響力。^[79] 美國戰後文化外交的基本理論是要達到「最有效的宣傳」，即「宣傳對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卻以為這個方向是他自己選定的」。^[80]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口述歷史：香港文學及文化」工作項目曾聚焦過相關

人物訪談。^[81]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很多親歷的訪談者並不以為當時在思想上受到控制或引導。

從趙稀方對「友聯」與《中國學生週報》的研究，以及張選中、蘇濤對美國亞洲基金會與亞洲影業公司的研究可發現：宣揚反共、擁護西方尤其美式的自由民主及文化民族主義理念，是美國新聞處（USIS-Hong Kong）和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82] 選取本地代理人，予以這些文化機構資助的真實原因；同時在去政治化的偽裝下，通過對傳統文化的重新闡釋，將西方價值觀植入其中，以對抗左派的意識形態。^[83] 文化冷戰初期在香港開展的「海外華人項目」「自由中國文學計劃」等均有很強的政治目的，與之相關的圖書與期刊翻譯、教科書寫作、創作及其他文學活動、各種資料彙編等，影響輻射整個東南亞。^[84] 從其他檔案文獻研究中亦可發現，到了1960年代後期，美國操縱的針對歐洲知識分子而建立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已經將其出版計劃擴大到非洲、阿

76 香港地方志中心編纂：《香港志：總述·大事記》，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第280頁。

77 〔英〕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曹大鵬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前言第2頁。

78 《中國學生週報》創刊於1952年，1974年停刊，是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份相當暢銷及長銷的青年綜合刊物。它結合了文學創作、文化啟蒙、聯絡組織學生文藝活動等，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幕後推動的亞洲基金會密切合作，致力於傳播西方自由民主價值和文化民族主義理念。《中國學生週報》早期以反共思想影響香港中學生，但在1950年代中期以後發生演變，呈現出向本土思想的轉變。《中國學生週報》對香港青年的文化思潮和文學新秀影響猶大，很多本土文人、作家參與其中工作或由這份刊物直接或間接培養出來的。李歐梵曾說過其初來香港任教時的《中國學生週報》，幾乎大中學校學生人手一冊，可見其影響力。參見嚴飛：《城市的張望》，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第87、88頁；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週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上〉，《二十一世紀》，2019年6月號總第一七三期；趙稀方：《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340-346頁。

79 黃維梁：《香港文學的發展》，王廣武主編：《香港史新編（增訂版）》（下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614頁；也斯：《解讀一個神話——試談〈中國學生週報〉》，見《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青文，1996年，第161-168頁；張楊：〈「前綫」外交：冷戰初期美國在香港的文化活動初探〉，《美國問題研究》2015年第2期，第22-44+198-199頁。其中張楊一文對香港1950年代「美元文化」（或「美援文化」）及美國以香港為基地的對華文化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做了詳細分析。張楊的《冷戰與學術：美國的中國學（1949-1972）》一書亦對亞洲基金會在香港以冷戰為目標的學術交流和思想輸出行動有介紹和分析。

80 〔英〕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曹大鵬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前言第5頁。

81 參見盧瑋鑾、熊志琴編：《香港文化眾聲道》（共兩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和2017年版。馮偉才認為儘管這項口述史項目對我們探求歷史真相有助益，佐證了友聯機構與美元文化的關係，但仍缺乏更深入的歷史挖掘和反思。馮偉才引用戴天2016年返港小住時說的話：「香港搞成今天這個樣子，我們那時所做的事也有責任。」參見馮偉才：〈在歷史的空間中對話——評《香港文化眾聲道》〉，《現代中文學刊》2017年第5期。

82 亞洲基金會（原名為自由亞洲委員會）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綫組織，定位為「準非政府組織」（Quasi-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其使命始終是「通過幫助亞洲個人和機構加強其各自國家的社會和機制來實現美國的政策目標」，即政治上推動亞洲反華親美，思想觀念上用自由民主取代一切不利於美國政策實現的共產主義、民族主義、中立主義思潮。美國中央情報局是根據1947年7月26日通過的美國國家安全法建立的。參見張楊：《冷戰與學術：美國的中國學（1949-197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57頁。

83 趙稀方：《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259-275頁；張選中：《美國亞洲基金會在亞洲的電影宣傳（1951-1968）》，東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第37-62頁；蘇濤：〈文化「冷戰」與香港右派電影的文化想像——以亞洲影業有限公司為中心〉，《文藝研究》2017年第3期。

84 前者致力於消除共產主義在海外華人中的影響，以作為美國對東南亞華僑的心理戰策略；後者試圖在有選擇性地救濟避難於香港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同時，利用其運作反共宣傳，並將香港打造成東南亞地區好的非共文學作品集散地。參見張楊：《冷戰與學術：美國的中國學（1949-197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4、84-86頁。